

到江苏工作,第一课就是了解江苏的省情。而要了解江苏的省情,首先是了解江苏的水情。水是江苏的最大特点,水是江苏生存发展的命脉,水是江苏人的灵魂。江苏因水而得名,因水而得势,因水而得益。我在江苏工作十年,对江苏还知之甚浅。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江苏,那就是“水做的故乡,水做的人”。抓住了水的特点,就找到了认识江苏的一条指导线索。

我观江苏

一、从乾隆下江南说起

在江苏,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。在江苏各地有许多乾隆下江南的文物遗存,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乾隆下江南的趣闻逸事。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巡幸江南,乾隆皇帝也效法皇祖,六次南巡。乾隆认为,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:一件是“西师”,率军西征,平定西北;另一件是“南巡”,在前后30多年中,六次巡视江南。可见下江南在乾隆心目中意义非同小可。

在当时的条件下,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从北京到江浙,往返6000华里。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全靠车装船载,马拉人扛,来回一趟,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。每次出巡,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、文武百官、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,动用五六千匹马,四五百辆车,上千只船,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。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高龄了,如此长途跋涉,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?

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解释,他下江南有四条原因:一是江浙官民诚心恭请;二是朝中百官一再建议;三是江浙人稠物丰,地位重要,应当亲自去考察民情戎政;四是恭奉母后,游览名胜,以尽孝心。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,其实乾隆心中有着更重大更深层的用意。

第一,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江浙一带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、丰饶之地、工商中心、赋税重镇,是清政府的主要“粮袋子”和“钱柜子”,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。在当时,江浙缴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%,税银占全国的29%,关税占全国的50%。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,盐课银的60%以上来自江浙,仅扬州盐商每年上交的盐课银最多时达600万两。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,2/3从江浙漕运进京。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,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。每次南巡,除了确保这些正常的国库收入以外,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、赞助、买官卖官、敲诈勒索、行贿受贿等手段,向江浙的官员和富商捞取许多私房银。可以说,牢牢控制江浙,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,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。

第二,江南出才俊,自古多风流。江南是一个人杰地灵、英才辈出的地方。在清代产生的114名状元中,江苏人有49位,占到43%。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,考生达2万多人。清代的状元一半多出自江南贡院。乾隆下江南的一个重要目的,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、培植士类、笼络人心。在六次南巡中,乾隆确实从江南物色了大批政界能臣、饱学之士、学界泰斗、书文大家。每次南巡,乾隆都要会见文人学士、名流缙绅,并亲自命题考试,对考试优秀者特批扩招“生员”名额,特赐“举人”称号,当场授予官位,以争取名士,宣扬盛恩。

在清代,江浙也是明末遗民众多的地方,反清思想广有市场。乾隆南巡时,一方面对文人学士采取怀柔笼络手段;另一方面又严加思想控制,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严厉打击,大兴文字狱。清朝是历史上文字狱最盛的时候,而乾隆执政时又是清朝文字狱的最高峰,罪名之荒唐,株连面之广,手段之残酷,远远超过康熙、雍正。乾隆较高的文化修养助长了他的文化神经质和思想多疑症。其中最典型的一件文字狱,就是在乾隆首下江南后,有人冒充大臣奏稿,批评乾隆下江南时奢侈浪费、严重扰民、赏罚不公等问题,乾隆大怒,下令在全国

追查这份伪奏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,被关押、撤职、杀头的人不计其数。

第三,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乡。尤其苏北地区是黄河、淮河、运河交汇之处,像洪泽湖、高邮湖等都是“悬湖”,一旦泛滥,淮安、扬州、泰州、南通、盐城等地则是一片汪洋。乾隆在《南巡记》中称:“六巡江浙,计民生之要,莫如河工堤防,必亲临巡视。”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“岁修银”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/10,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。每次下江南,乾隆必到洪泽湖流域巡察河防工程。六次南巡中,乾隆共发出数百条治水命令,实施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,动用了上千万两白银,对减少水患、保护田园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第四,江南是“花柳繁华地,温柔富贵乡”。山川风光秀美,人文资源丰富,金粉佳丽众多,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话来说是:“佳山佳水佳风佳月,千秋佳地;痴声痴色痴梦痴情,几辈痴人。”在乾隆时期,长江运河两岸的都市商业繁华、人气旺盛。当时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,江苏占据其三——南京、扬州、苏州。南京人称“江南佳丽地,金陵帝王家”,十里秦淮,九曲金波,六朝金粉,一帘幽梦。苏州园林,享誉天下;苏州刺绣,巧夺天工。再加上小桥流水,粉墙黛瓦,充满着诗情画意。扬州更是富商云集,美景、美女、美味,一应俱全。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”,可见当时的扬州是一个著名的梦幻之都、休闲之都、消费之都。皇帝来到江南,看得开心,玩得尽兴,吃得可口,购得满意,当然是乐此不疲、频频光顾了。

对江南的园林,乾隆更是情有独钟。每次下江南,他都带来一些画师,把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描绘下来;而后,在北京颐和园、紫禁城、承德避暑山庄中,对苏州狮子林、杭州西湖十景、无锡寄畅园、镇江金山寺等园林景观加以仿建。

第五,皇帝出巡,安全第一。江苏没有高山峻岭、荒蛮之地,盗贼流寇难以藏身。特别是江苏人禀性温顺,循规蹈矩,不狂不蛮,安分守己,加上日子比较富庶,属于那种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的地方,是少有的一个良民区、顺民区、治安模范区。皇帝到这里,凶险较少,安全可以得到保证。

对于乾隆六下江南,从古到今,人们都是毁誉参半,褒贬不一。即使在当时,朝野对乾隆下江南时好大喜功、追求奢华、讲究排场、劳民伤财的行为也多有质疑。乾隆在退位之前曾对大臣讲:我临御60年,并无失德,惟独六次南巡,劳民伤财,将来你们务必阻止皇帝南巡之事发生。然而,毋庸置疑的是,如果不是处在太平盛世,就不可能有皇帝六巡江南的盛举。这六次南巡,对于清政府安定江浙,聚集财力、吸纳人才、安抚人心、兴修水利、治理水患等,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回顾乾隆六下江南这段历史,对于我们了解江苏的历史、认识江苏的省情是大有帮助的。

二、水做的江苏

江苏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一块风水宝地,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方面有着相对优势。在唐代之前,江苏的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。唐宋之后,江苏逐渐崛起,在全国的地位影响节节攀升。近千年来,江苏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跨越。

第一次大跨越发生在宋代。自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,江苏的优势开始显现。宋朝时,北方和中原地区战事频仍,民不聊生,迫使宋朝政治中心南移,随之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。许多官宦世家、名门望族、商

贾富豪、文化精英都到江南定居。中原地区先进的知识、技术、文化以及资金、人才涌入江南,形成了江苏第一次发展高峰期,并造成了此后近千年不衰的局面。

第二次大跨越发生在清代。随着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世界海洋经济的兴起,江南又成为近代工业经济、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祥地。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,江南也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过渡到以工商业为主的近代经济,江苏则成了全国近代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龙头地区。

第三次大跨越是改革开放时期。新中国的成立,推翻了百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,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政治热情和创造活力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多年里,江苏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,成为市场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,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有显示度和说服力的窗口地区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。可以说这30多年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,这30多年带来的城乡巨变使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。如今的江苏,以占全国1%的土地,5.7%的人口,创造了占全国1/10以上的经济总量,17%的外贸总额。

其实,江苏人稠地少,自然资源相对贫乏。它最大的比较优势,第一是水,第二是人。江苏的发展经验有千条万条,最根本的是两条:一条是以水为宝,因此务必把江苏的水资源利用好、开发好、保护好;另一条是以人为本,因此务必把江苏的人力才资源利用好、开发好、保护好。

先说江苏的水。江苏是著名的水乡。水是江苏最大的特点、最大的优势、最大的发展潜力,也是最大的发展隐患。

江苏拥有1.73万平方公里的水面。水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7%,这一比例在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中名列第一。江苏也是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中唯一的大江、大河、大湖、大海全都具备的地区。长江、淮河横穿东西,大运河纵贯南北。大小湖泊290多个,星罗棋布,水面有6800多平方公里,全国五大淡水湖江苏有其二,太湖地处江南,洪泽湖位居江北,流域面积均有4万平方公里。全省大小河流2900多条,纵横交错,水网密织,内河航运四通八达。同时,还有近千公里的海岸线,使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相互贯通。再加上四季分明、雨量相对充沛的气候条件,这些都为江苏的农业、工业、商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。经过新中国60年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,过去对江苏威胁最大的洪水灾害已大大减轻。现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困扰,相比之下,江苏的水资源优势更加难能可贵。

如果说,过去江苏最大的水患是洪涝,那么,今天最大的水患则是水质污染。2007年发生的无锡市太湖水源污染事件,造成了数百万人一度断水的困难局面。这个事件发生在无锡或是苏州具有偶然性,然而这种偶然性中却包含着必然性。太湖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,每平方公里上居住着上千万人,县乡以下的生活污水大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。太湖流域又是工业企业最密集的地方,每平方公里上有十余家企业,大量工业废水也未曾达标而排放。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、农药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染,而太湖养殖的过度发展也成为一大污染源。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,使太湖水质一直在四类水和五类水之间徘徊,因此出现这种水源污染事件并不足为

怪。太湖是苏南地区的母亲湖,关系着周围3000多万人的生计和安全。长期以来,人们一味地向“母亲”索取,很少给予她必要的关爱和回报。这次污染事件告诉人们,太湖这个“母亲”不堪重负,已经病倒了,难以承担起“母亲”的使命了。

由太湖污染想到了其他江河湖海。现在大多数河流、湖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,有些已经干涸,有些虽然有水但却失去了水的功能。中华民族有两大母亲河——黄河和长江。黄河早已是泥沙滚滚、经常断流了;长江成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条生命线,大半个中国把水的希望寄托在长江上。今天的长江是全国最大的取水口,也是最大的排污道。过度的工业化开发已使长江伤痕累累,数以万计的化工、冶炼、发电、造纸、拆船造船等企业堆集在长江两岸。假如像2005年11月松花江化工厂污染事件发生在长江上,那后果不堪设想。

江苏是一个典型的靠水吃水的地方。一旦水吃不上了,那就断了江苏的生路,毁了江苏的前程。所以江苏人应当像爱护命根子一样去珍惜和爱护江苏的水资源,那种只开发不保护、只索取不回报的时代应当结束了。欧洲莱茵河的治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。莱茵河是欧洲的母亲河,流经瑞士、德国、奥地利、法国、荷兰等五个国家。40年前,莱茵河两岸是欧洲的工业长廊,大量的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向其中排放。莱茵河成了欧洲“最大的下水道”,“最浪漫的臭水沟”。1986年瑞士的一家化工厂爆炸曾使莱茵河一度成为死亡之河。之后经过20多年严格的治理,使莱茵河重新成为一条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,成为一条著名的风景观光带,但恩明日的长江也像今日的莱茵河那样,清澈明亮,鱼游鸟翔,两岸飘香。

三、水做的人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如果说江苏是水做的故乡,那么江苏人也是水做的人,水的性格、水的性格,决定了江苏人的文化品格和国民精神。尽管苏南人、苏中人、苏北人也存在着许多性格上的差异,但总体上说,水是江苏人的灵魂。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水的最大特点是活性和灵性。江苏人天性聪慧,脑子灵活,不但爱读书,而且会读书,许多人似乎天生就是读书的材料。而且江苏尊师重教、好文兴学之风根深蒂固,世代相传,在子女教育上,特别舍得花钱,舍得花力气。从古到今,不知从江苏大地上产生了多少才子、文人、学者、名家,真可谓是英才辈出,群星灿烂。到江苏各地考察,当地人最津津乐道的,就是那里产生过多少个名人名家。仅苏州市,历史上就出过50位状元,1500名进士,产生了伍子胥、孙武、项羽、范仲淹、沈周、唐寅、文徵明、冯梦龙、蒯祥、顾炎武等名垂青史的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书画家和工艺大师。宜兴一个县级市,走出了4位状元、10位宰相、385名进士,还有80多位大学校长、23位两院院士和8000多位大学教授和副教授。

今天,江苏仍然是全国教育最发达、人才最集中的省份。全省大部分地区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,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95%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122所,在校大学生165万人,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40%,苏州、无锡等苏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50%以上。江苏籍的两院院士目前已达300多名,在全国各省、市中遥遥领先。

江苏在教育文化和国民素质方面所具有的优势,成为江苏持续发展最宝贵的资源。

江苏人勤劳敬业,吃苦耐劳,认真仔细,心灵手巧,这是江苏成为制造业基地的重要原因。江苏人的富足首先归功于他们勤劳敬业,赚的多是辛苦钱。很多人富而不懒,不图安逸,日夜忙碌,终年不息,以至于双休日、节假日也不肯休息。当然,我们并不提倡节假日不休息,但这种勤劳敬业精神还是值得钦佩的。当初江苏在兴办乡镇企业时提出的那种“千山万水、千言万语、千辛万苦、千方百计”的口号正是江苏人精神的一种写照。目前江苏的建筑大军已是举世闻名了,他们拥有500多万人的队伍,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,每年创造的总产值上万亿元。江苏建筑队的质量信誉也是众口皆碑的。

江苏人做事决不是一味傻干,只卖苦力气。他们既勤劳又智慧,处事精明但不油滑,不怕吃苦又善动脑筋,拥有无数的能工巧匠。苏州有四大“发明”,即苏州园林、苏州刺绣、苏州昆曲、苏州评弹。这四种东西看起来互不搭界,但其中却包含着共有的一种苏州精神,即“小、精、灵”,也就是小巧、精微、精细、精致、精干、灵巧、灵活、灵气。有的外商说,看了苏州刺绣,就知道苏州电子信息业为什么能快速兴起。

江苏人的性格温顺、顺和,不急不躁,不鲁莽,不刁蛮,不狂躁,不冲动,以柔克刚,持之以恒,温文尔雅,讲究礼貌,颇有些“温良恭俭让”的风范。就像淮扬菜那样,以做工精细、平和清淡而出名。江苏人彼此之间如果有意见,有矛盾,底下咕咕唧唧也就罢了,很少公开挑明,死磕硬碰,他们似乎更相信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的信条,更少去干那种“一不做,二不休”、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的鲁莽事情。江苏的男性多柔少刚,多文少武,识有余而胆不足,或许少了点男子汉敢说敢干、敢做敢为的气魄。江苏的女性温柔细腻、文静含蓄、勤勉贤惠、善解人意,颇具东方女性之美。如果让江苏男子作为中国男性的标志,可能不少人持有异议,但如果让江南女性作为中国女性的标志,估计多数人会同意。

如果你从北京来到南京,会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氛围和思维方式的不同。

北京不愧是全国的政治中心,北京人的政治思维发达,政治嗅觉灵敏,政治热情高涨,怀有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强烈社会责任感,一个普通市民也像个政治家,“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”而江苏人则不同,他们经济头脑发达,建设意识和务实精神很强。江苏人对政治事务也关心,但主要限于一般性的了解,自己弄个明白也就是了,往往敬而远之,不会动心动情地去争论,更不会冒冒失失地参与。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对事业和生活的追求上,最关心的是平平安安过日子,一心一意奔小康,与当地发展和自身利益无关的事,他们不太会关心。任何新政策出台,他们总能很快找到与当地发展和自身利益的结合点,接过口号,为我所用,在政策变动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江苏人这种重建、重实际、重利益、重生活的态度,同北京人那种重政治、重思想、重民主的氛围形成了一种明显反差。北京人喜欢高谈阔论,争论不休;而江苏人则不爱争论,不爱管闲事,埋头干自己的事。北京人为人处世比较豁达、豪爽、讲义气、重友情、不拘小节、洒脱幽默,在这些方面,江苏人欠缺一些。北京人观察事物的标准是多元的,政治标准常常作为第一位的考虑;而江苏人观察事物的标准更加务实,更加注重利益原则。